

準個體時代的寫作

• 黃發有

沒有如蛇的夢魘纏身，沒有裝扮成道德的殘忍來壓抑，這樣美妙的個人不能不讓我心旌搖蕩。但當前眾多批評家聲嘶力竭地鼓吹的「個體時代的個人化寫作」，對我而言似乎只是越充越飢的畫餅，這難道正是魯迅所言的「預約的黃金世界」？

戴着「個人化寫作」冠冕的「晚生代」作家，有點突兀地湧現於90年代的中國文壇，他們大都出生於60年代，主要代表有：何頓、邱華棟、韓東、朱文、畢飛宇、魯羊、王彪、東西、李大衛、李馮、張旻、述平、刁斗、丁天、陳染、林白、徐坤等。苦難的歷史記憶並沒有在他們心靈上留下太深的刻痕，高等教育和城市生活背景也使他們對磨難極為淡漠，市場經濟的勃興和西方文化的滲透更在很大程度上消蝕了中國傳統的「道統」的浸濡。相對於「五七」一代、紅衛兵和知青的動盪生涯，他們的成長沐浴着讓其祖輩和父輩欣羨不已的幸運陽光。但對於試圖登上文學舞台的青年人，這又何嘗不是一種殘缺？這樣，顧影自憐就不能不成為這一代的代碼。既

然言說苦難成了「五七」和知青作家們的專利，形式實驗的高地也被余華們捷足先登，那麼，留給這一代的出路似乎只能是自說自話。因此，晚生代的寫作姿態與其說是自覺，毋寧說是無奈。而且，在他們反主流的姿勢背後，又何嘗沒有取而代之的衝動。

我認為，將90年代命名為「個人化時代」只是隔靴搔癢的描述。這種觀點認為，作為群體時代的80年代存在着人道主義關懷、文化啟蒙等一系列文化範式或共同的話語系統，而90年代則是一個價值多元、文化失範的年代，個人性得以在中心崩潰的縫隙中確立。但這種判斷只是機械地照搬「後現代」、「後殖民」等西方話語的結果，是在渴求與世界接軌的攀附願望驅使下的誤診。將80年代和90年代一刀兩斷的做法人為地阻斷了歷史之流，是對無法承受的歷史連續性的逃避。90年代並非人云亦云的沒有主題的年代，而是主題在跳盪表象的掩蓋下變得更加隱晦和深奧，時間本身便是讓人不堪重負又無法繞過的元主題。當晚生代作家以空間化的時間來強調瞬

間，通過躲避線性時間來維持脆弱的個人，來逃避群體的脅迫和普遍經驗的兼併時，這種逃避本身和他們所逃避的對象就成了傾注着他們所有的愛恨的元主題。晚生代作家及其筆下的主人公與其說是「漫遊者」，毋寧說是「出逃者」。漫遊的基本前提是自由和自主，而他們卻受厭倦和焦灼所驅使，陷入了一種強制性的重複狀態。他們通過空間的轉換來轉移對時間的注意力，新鮮感和好奇心給他們帶來時間重新開始的錯覺。然而，當他們只有在陌生環境中才能確證自我的獨立、才能擺脫陷入重圍的湮滅感時，這種逃離註定只能陷入怪圈。真正的個人是時間的主體，就算他有權不為了前輩或後代生活、有權不承擔歷史延續感，但作為個人，他最起碼應當承擔自我的連續性。事實上，他們無法承擔的恰恰是他們自己。因此，這樣的個人充其量只能是瞬間的個人。韓東在〈小說家與生活〉中流露出清醒的痛苦：生活「是常恆的、本質的，而非轉瞬即逝的」。正是在這種意義上，他們的逃避是無效的。這種表面被眼花繚亂的現象所切碎的時間像一條無形的、尖銳的鐵絲，依然有效地刺穿他們的生命，並將他們牢固地統攝其中。還有，當前眾多評論家強調的話語多元傾向，同樣只是一種表層描述，並不是每一種說話都有資格成為一個獨立的「元」，有不少喧嘩只不過屬於同一「元」的不同側面，而更有不少說話只是橫飛的唾沫。

晚生代由於無法以生存體驗取勝，只好開掘自我的成長體驗，他們的敘述大多採取童年視角或青少年視角。把未成年時期的渾蒙狀態作為「個人性」得以保留的飛地，顯然是曖昧的。這代人的成長歲月都早於

90年代，就算這些主人公獲得了「個人」的資格，也不全是90年代的功勞。而且，在這種不露懷舊痕迹的回訪姿態背後，潛藏着的正是對於自我被當下所兼併的痛苦現實的迴避。必須強調的是，當作家對於有限的私人經驗的迷戀滑向喋喋不休的重複狀態時，成長過程就進入一種人為的延長狀態。一個真正的個體時代的本質特徵不應是展示隱私去迎合別人的窺視欲，而是對隱私的尊重。最為關鍵的是，晚生代作家筆下的私人經驗基本上是封閉型的，必須通過斬斷自我與外界的有機聯繫來保持其獨立性和完整性。我想，個性不是在獨處中內省出來的，真正的個人只有在人海的盪擊中才能站立起來。因此，確切而言，這個所謂的「個體時代」只能算是準個體時代。

晚生代的所謂個人性必須以他們的邊緣狀態為前提，他們一旦脫離邊緣而楔入一個相對固定的位置，這種個人性勢必搖晃不止。而且，他們從不掩飾對自己的無席者處境的惶恐和對上流社會的嚮往。邱華棟坦率地說道：「既然機會這麼多，那麼趕緊撈上幾把吧，否則，利益分化期結束之後，社會重新穩固，社會分層期結束，下層人就很難進入上層社會了。」《所有的駿馬》中的林格頗為欣羨巴爾扎克筆下不擇手段地往上爬的拉斯蒂涅，並揚言：「咱們要向他學習，在北京那樣該死的可怕的地方站住腳。」何頓的大部分小說所傳遞的，同樣是佔取一席之地的強烈籲求。這樣的「個人」僅僅是一種無奈的權宜之計，它毋寧說是一種包袱。他們站穩腳跟的那一天，也就是他們脫下「個人」的外衣的日子。

魯迅在《狂人日記》的開篇交代狂

人「已早愈，赴某地候補矣」，其中蘊涵着作家對個人在中國的未來命運的深刻得近乎殘忍的洞察。不容忽視的是，現代工業的強大的聚合力量也極為有效地瓦解這種脆弱的個人性，這對於中國面容模糊的個人而言不啻是雪上加霜。邱華棟的《公關人》、《環境戲劇人》、《鐘表人》、《別墅推銷員》等作品，就揭示了人們在工作身分的轄制下淪為平面人的境遇。這組模式化的作品道破了當今時代對人們所實施的更加間接、隱蔽和有效的控制。正是在此意義上，自由作家或自由撰稿人同樣是一種身分和模式，它同樣攜有削磨個性的無形刀片；商業化的外部社會的壓力，規定了他們的寫作首先是為稻粱謀的活命手段。因此，自由作家的出現只是為個人化寫作提供了某種可能性，但自由寫作並不能等同於個人化寫作。

晚生代作家書寫欲望的偏嗜常被視為對壓抑和禁欲的反抗，但其中逃避感情和乞靈於技術的傾向卻使反抗禁欲主義的行動淪為一種新禁欲主義。對於肉欲 (sex, lust, libido) 的過份宣揚扼殺了愛欲 (eros)，這樣的自由只能是新型的枷鎖。在欲愛還休的躊躇和欲罷不能的沉溺之間掙扎的狀態，是愛的力量逐漸死亡的過程。沒有愛的能力的「個人」，可能是真正的個人嗎？「為迴避愛而逃往性」，逃避冒充成了解放，倒退偽裝成了進步。通過付諸行動以避免內省的折磨，這是張旻、邱華棟、朱文、刁斗等男作家筆下的主人公沉迷欲海的心理根源。而在女作家筆下，林白的性描寫較為坦率和露骨；而自戀傾向較為濃重的陳染，則偏向於表現自傳色彩極為鮮明的女主人公的試探、閃躲和猶疑，進退兩難的處境把作家逼進了「無

處告別」的死胡同。而對兼併個人的群體力量的一味抗議，使自己成了抗議對象的影子，自動地將主動權奉送給對方。更為重要的是，對自我身體的關注固然是對忽視肉體的年代的反叛和挑戰，但誠如羅洛·梅 (Rollo May) 所言：「無論自我、軀體，還是無意識，都不可能是『自主』的，而只能作為整體的一部分而存在。……這意味着自主和自由不可能屬於機體某一特殊部分，而必須是整個自我 (思維、情感、選擇、行動的主體) 的一種性質。」因此，將身體視為欲望的載體，只能是對身體的奴役。

綜上所述，晚生代的寫作尚未具備「個人化寫作」的本質特徵，但在外部形態上已經初步具備了「個人化寫作」的某些屬性。如果深究其意義，它不在於展示了中國的個人的精神風貌，而在於揭示了在當今時代成為個人的艱難。可以消融個性和庇護身家性命的群體大廈搖搖欲墜，時代的放逐逼使他們茫然地向前尋找，但尋找的結果似乎並沒有通向個人的「天堂」。從自戀走向自虐，再走向自欺；從蒙昧走向瘋狂，再走向麻木。這種惡性循環使多數軟弱者的「個性」挫損殆盡，但同樣也為極少數內蓄着強大的離心力和堅韌性的人們提供了衝破硬殼並走向個人的可能。基於此，我情願把晚生代的寫作稱為**準個體時代的準個人化寫作**。我認為只有充分認識到成長為真正的個人的艱難，真正的個人才能穿越美麗的誘拐和自設的深淵、才能在荊叢中誕生和挺立。

黃發有 上海復旦大學中文系博士生，已發表文藝評論、學術隨筆多篇。